

试析日韩安全合作关系新趋势

——基于“复合同盟”理论视角

○ 李庆四, 何霁赠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传统上,日韩是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式”(Hub-Spokes)安全架构下进行“准同盟”形式安全合作。随着日韩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并围绕《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展开进一步磋商,双方安全合作关系逐步加强并呈现出转向“同盟”^{〔1〕}的趋势。但是,传统、单一的同盟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出日韩转向“同盟”的行为动机,而整合各同盟理论流派观点的“复合同盟”视角能对双方行为做出更为科学客观的解释。本文认为,应对朝鲜威胁的主观意愿、制衡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压力和美国居间的不断撮合是促使日韩安全合作走向“同盟”的三重驱动力。然而,由于双方对具体国家利益关切角度的不同又分别显现出韩国侧重应对“威胁”而日本侧重实现“利益”的差异性特征。未来日韩走向“同盟”将受到双方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分歧、国内政治的发展、对华和对朝政策的差异及中美、美朝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双方走向“同盟”的实质性举措也将对域内和域外利益相关国家及东北亚安全形势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日韩安全合作;同盟理论;差异性特征;制约因素;未来影响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22

历史经验表明,对“同盟”形成动因的忽视,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并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2〕}一战前德国对 1892 年法俄结盟和 1907 年英俄关系缓和的错愕以及二战中日本单方面认为与德、意组成“轴心国”同盟将迫使美国在日本远东扩张计划上采取“忍让”态度的误判,都不同程度左右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态势。^{〔3〕}时至今日,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在朝鲜核问题悬而未决,中日韩三方在历

作者简介: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何霁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史问题、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上的分歧以及美国为护持全球霸权不断介入本地区事务背景下，“巴尔干化”特征愈发明显。^[4]换言之，任何本地区利益相关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或是具体行为的实施，都将对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深刻影响。2016年11月23日，日韩两国正式签署中断谈判四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下文简称《协定》），并于2017年8月宣布将《协定》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11月，这凸显双方尝试突破传统“轴辐式”安全结构和“准联盟”安全合作关系，呈现出迈向“联盟”的新趋势。可以说，未来日韩安全合作关系走向“联盟”并不是一项“伪命题”。因此，以理论为导向，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剖析日韩安全合作关系新趋势，不仅能总结历史的宝贵经验，考量当下国际和地区局势，还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地区和国际态势尽可能做出精准的预判。

一、日韩安全合作关系再定义：“准联盟”转向“联盟”

“同盟”(alliance)或“联盟”(alignment)被看作是国家增强国家权力、应对外部威胁、追求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联盟体系不论是形式还是功能上都有所弱化，与此相伴产生了诸如“联盟终结”和“联盟无用”等观点。^[5]然而事实上，虽然苏联的突然解体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程度上有所降低，以及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对美国传统经济霸权的冲击，都曾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欧洲联盟体系和美日同盟体系有所冲击，但这些传统联盟形式在危机过后都保留了下来，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逐步完善和巩固的迹象。可以预判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联盟体系不会消失，它将会不断进化和调整并以新形态继续生存下去。传统上，日韩安全合作关系被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如车维德定义为“准同盟”(Quasi-alliance)形式。^[6]国内学界也认为日韩安全合作关系始终是美国传统东亚盟友体系下的附属产物并表现出“准联盟”特征。^[7]而同盟理论对“联盟”概念的定义也很具体。^[8]根据各同盟理论对“联盟”定义的总结，笔者将“联盟”定义概括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为增加权力或维护安全，针对其他特定国家，在安全合作方面进行的正式安排。换句话说，“准联盟”形式的安全合作关系是双方或多方决策者在心理或行为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并未签订正式的军事协定或盟约，而“联盟”安全合作关系则规定了双方或多方安全合作的内容、范围、手段及目标。日韩《协定》的签署，从理论上考量，是双方安全合作由“准联盟”向“联盟”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第一，《协定》的签署表明日韩已打破双方传统上安全合作领域的心理或行为“默契”，由非正式防务关系向正式安全“联盟”迈进。事实上，从《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的“涉韩条款”到定期举办的美、日、韩三国外长磋商，再到美、日、韩全方位联合军演，日韩非正式防务合作始终是在美日、美韩同盟框架下进行的，双方从未就某一安全议题建立直接军事合作关系，而此次签署的《协定》是日韩建交以来首次直接达成的正式安全合作协议，具有历史性意义。根据《协定》，为应对朝鲜核导威胁，日韩可直接共享“包括朝鲜核导信息在内的二级以下军事

机密”。^[9]显然,日韩签署更具有针对性、内容更具体、手段更明确的安全合作协议更符合同盟理论中的正式“联盟”行为特征。

第二,《协定》的签署使日韩事实上突破传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向双边直接军事安全合作关系转向。日韩一直是美国所主导“轴辐式”(Hub-Spokes)安全结构两端的重要支点。^[10]美国在为日韩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同时,使它们成为应对朝鲜威胁和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进而巩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霸权地位。同时,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日韩也不断调整和巩固各自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而相对于紧密的美日和美韩同盟,日韩安全合作关系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但是,朝核威胁、中国崛起以及美国亚太战略收缩推动着日韩在安全领域合作逐渐活跃起来。《协定》内容明确规定“日韩可不经美国直接共享……军事机密”,^[11]虽然此内容被认为是日韩为了更快速分享朝鲜核导信息情报,实现对朝情报的“互联互通”,但“不经过美国”这一关键字眼被认为是对传统东亚安全合作框架的“尝试性”修正,为双方未来安全合作留下想象空间。

第三,《协定》的签署也表明日韩逐步摆脱“负面镜像”(Negative Image),在安全合作领域谋求更多共同利益。日韩安全合作被定性为“准联盟”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们认为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归属上的分歧,双方在美国主导下的安全合作一直呈现“貌合神离”的状态。^[12]但是,双方决策者逐渐意识到比思想认识分歧更为紧迫的是应对外部威胁和实现国家利益。虽然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和朴槿惠任期内,日韩政治外交关系由于领土归属和历史问题的分歧陷入近十年来的最低谷,但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却并未像政治外交关系一样止步不前。相反,日韩决策者试图不断修正和尝试摆脱“负面镜像”对双方在安全合作领域的束缚。韩国方面,朴槿惠在任期内力促重启韩日安保政策会议,并逐渐将韩国对日外交策略从与历史问题的“绑定”转为“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并行的双轨制,^[13]坚持历史遗留问题韩方坚决不退让,朝核等安全议题韩方与日方共享利害,经济和文化韩日加强合作的方针政策。^[14]日方则认为,与中国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坚定且强硬的态度不同,韩国所持立场和处理方式相对于中国更为灵活。^[15]2015年底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更使日方看到解决对韩战后遗留问题并进一步发展同韩国安全合作关系的愿景。《协定》的签署从侧面反映出日韩在面对更为紧迫的外部威胁和现实的国家利益时,“负面镜像”并不能单独成为阻碍双方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制约因素。

二、日韩安全合作转向“联盟”的三重驱动力

国际政治学界根据不同范式对国家“联盟”的动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占据着主流地位,“联盟困境”和“制衡与追随”等学说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同盟理论。但是,在各国间交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并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任何单一、割裂的同盟理论都已不能客观准确的解释国家间“联盟”的行为,只有将各家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起来,以

“复合同盟”理论视野去剖析,才能更为准确研判国家选择“联盟”的动机。本文“复合同盟”视野是以“权力”“威胁”和“利益”作为主变量,并将美日韩之间“联盟困境”和中日韩之间的“制衡与追随”情境纳入考量来剖析日韩安全合作关系新趋势。此角度较单一同盟理论分析国家间联盟行为更为全面和深入。概括来说,威慑朝鲜、制衡中国和美国的撮合是驱使日韩走向“联盟”的三重驱动力。

第一,日韩认为彼此都处在朝鲜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巨大威胁中,消除本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双方合作的认知基础。^[16] 国家选择联盟是对“威胁”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权力”做出的反应,国家在面临威胁挑战时,更可能会采取联盟措施来应对威胁。^[17] 而国家的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战争方式和进攻意图则是国家判断“威胁”大小的重要依据。^[18] 因此,朝鲜威胁是日韩走向“联盟”的重要动因。朝鲜方面,虽然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但为谋求自身安全和生存,继续贯彻“先军政治”战略思想,其仍将每年 30% 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常规武器发展和核导技术研发领域。^[19] 朝鲜如此高的军事支出占比使日韩在军事力量发展道路上压力倍增。而地缘上的远近又直接决定威胁程度的高低。^[20] 朝鲜与韩国陆地接壤又与日本隔海相望,其强大的常规武器力量和飞速发展的核导技术已经成为日韩的“噩梦”。常规武器方面,朝鲜宣称部署在朝韩边境朝方的 500 门“谷山”自行榴弹炮和 200 部“MRL-240”火箭炮可以在战争开始后半小时内将首尔“夷为平地”。^[21] 而射程覆盖日本全部领土的“芦洞”“舞水端”和“大浦洞”各型导弹也使日本如坐针毡。朝鲜亮相于 2012 年平壤阅兵式的“KN-08”远程弹道导弹和 2015 年试射成功的“KN-11”潜射弹道导弹更使其初步具备了远程导弹打击能力。核武器数量上,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报告显示,朝鲜在 2014 年已经实际拥有 6—8 枚核弹头。^[22] 而且,朝鲜不断尝试改进技术以使弹道导弹小型化和成熟化,追求发射工具多样化,并试图谋求战略核打击能力以震慑敌对国家。日韩一致认为朝核导武器研发计划将严重损害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接受的。^[23] 与此同时,朝鲜也在不断加强网络攻击能力等非传统军事力量。传统上,朝鲜坚持用常规军事手段与敌人“短期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24] 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朝鲜经济面临制裁而濒临崩溃,迫使它将主要精力转向对美日韩的非对称战力发展上。朝鲜曾多次针对日韩进行网络攻击,虽然并未对日韩造成实质性破坏,但已经达到了制造紧张气氛、消耗对方实力的目的。^[25] 这种以传统军事手段为主,非常规军事手段用以补充的威慑方式给日韩带来了沉重负担和持续安全隐患。可以说,日韩转向“联盟”是双方应对朝鲜常规和核导武力威胁,防范朝方非对称战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无奈选择。

第二,日韩在制衡中国崛起议题上的共同利益诉求促使双方转向“联盟”。理论上,“联盟”被认为是“为反对某人或某物而衍生出来对某人或某物的支持”。^[26] 换句话说,单个或多个国家主观能动的选择“联盟”行为并不是为了联合单个或多个国家反对某国,而是为了反对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结盟。而且

国家也常为了扩大本国所认定的具体国家利益和目标“主动而不失时机”的选择联盟策略。^[27]或者说,是国家的“利益”的有无而非“权力”的强弱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人和盟友。^[28]中国崛起之势下,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来说,经济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从2001年的13323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16年的111990亿美元。^[29]截止至2016年底,中国GDP总量已为日本两倍之多,更是同年韩国GDP总量的十倍以上。政治外交上,中国在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强调“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和管理地区事务,带来了如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同东盟之间合作不断深化等积极成果。而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更显示出中国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决心。^[30]军事上,以中国海军为例,截至2015年6月,中国海军计划、在建和已建舰船共计23型近73艘合计约34万吨,其中包括8艘大型903型补给舰,2艘航空母舰和18艘具备强大攻击能力的055型导弹驱逐舰。^[31]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日韩在地区政治议程上被边缘化,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面临巨大挑战已成不争事实。日韩选择“联盟”正是双方在谋求更大战略发展空间和联合制衡中国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经济上,虽然韩国希望借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其对中国经济崛起后在科技和贸易等方面日渐增强的竞争力担心不已。政治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韩国作为中等力量(middle power)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被夹在中美间进退两难。^[32]中韩在朝核议题上的分歧也影响着韩国对中国的认知。^[33]由于中国对韩美严厉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朝鲜持部分保留态度,致使韩国认为中国是在“偏袒”和“鼓励”朝鲜,并意识到有必要对未来中国的战略意图做出最坏打算。^[34]与对中国持消极看法相反,韩国认为日本在安全方面将是韩国在未来国际局势中合作的对象。^[35]与此同时,中日在东亚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引起了日本国内政坛和学者们的担忧。经济上,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实力增长的太快,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被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所吞并。^[36]政治上,日本政府 and 学界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是否会对日本和美国构成安全上的实质性威胁,有必要对未来中国可能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作出充足准备。^[37]军事上,日本则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增长迅猛,军事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不明确,军费开支透明度较低,未来可能会对日本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38]

日韩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反映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根据韩国峨山研究院调查显示,分别有66.4%和71.9%的韩国民众认为中国应被视为韩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而相对于35.9%的韩国民众支持中国成为未来亚洲领导者,有55.4%的韩国民众持反对观点。^[39]日本智库言论(Genron)NPO调查表明,超过9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且83.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将交恶。^[40]有60.9%的日本受访者对中日关系现状持否定态度。^[41]由此可见,

日韩从政府层面到民众心理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结构性压力的担忧是驱使双方走向“联盟”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三,美国居间力促日韩加强安全合作关系也是双方走向“联盟”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国家选择“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应对威胁而增强国家权力,^[42]在美国看来,崛起的中国和朝核导计划已经对美国地区乃至全球霸权提出了“挑战”。美国认为其在东北亚地区任何主动或被动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行为都将导致地区权力的真空,将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巨大挑战,后果不堪设想。^[43]为了维护地区霸权,遏制中国崛起,奥巴马在任期内着力布局“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巨额财政赤字和军费支出缩减又使其在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44]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则继续处在由“过度扩张”而导致的战略收缩阶段。^[45]而美国精英和民众间普遍兴起的“新孤立主义”思潮也驱使美国将更多的精力从国外转向国内,以求“用实力换和平”。^[46]其要求盟国负担更多防务费用和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言论更使日韩两国对美国未来履行安保协定的信心倍受打击。^[47]美国的这种“软弱”和“举棋不定”使日韩认为随时面临着被美国抛弃的危险。日韩为摆脱“联盟困境”需要一方面采取自卫措施,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在传统“轴辐式”安全结构遏制中国愈发捉襟见肘时,试图通过加强日韩双边安全合作关系来抵消因其实力相对衰落给传统“轴辐式”安全结构带来的冲击。^[48]日韩转向同盟可以及时弥补美国力量收缩的空白并使美日韩三边防务合作更加高效。^[49]美国认为尽管日韩有关历史和领土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但因朝鲜威胁和中国崛起驱动的共同利益,将促使双方以美国为主导组建它们自己的同盟。为改善日韩关系受制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彼此心存芥蒂这一局势,美国也始终努力撮合双方关系向前发展,日韩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的和解正是美国从中调解的结果。^[50]而《协定》的签署,无疑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成果,有利于实现美国拉拢日韩构建东北亚“小北约”的构想,进而巩固美国地区和全球霸权。

三、日韩安全合作转向“联盟”是各取所需

对具体国家利益关切角度的不同,使日韩走向“联盟”的驱动力呈现出差异化特征。韩国更多是为应对来自朝鲜的武力威胁,寻求国家自身安全。日本则更侧重于实现其“稳定而分裂”的朝鲜半岛外交战略,联手韩国制衡中国,更是其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抓住机遇寻求“国家正常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韩国选择与日本“联盟”是以“威胁平衡”为主导的动因驱使。国家面临外部威胁越大,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越高,联盟瓦解的可能性也越低。^[51]韩国对于朝鲜军事力量的主客观风险感知相对于日本更加强烈。对日本来说,如果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而爆发常规战争,日本可依托韩国陆地和日本海峡作为军事缓冲地带。即使朝鲜半岛爆发核战争,日本业已成熟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的核保护伞都将是日本较于韩国的优势。与朝鲜山水相连的韩国则对来

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实力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更为敏感。^[52] 面对未来可能或急需化解的外部威胁,选择同盟的国家可以获得别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威慑和制衡敌人。^[53] 韩国希望日方可以向其提供关于朝鲜的卫星图片、潜艇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情报信息,并借助日本已经掌握的韩国最希望获得的尖端武器系统使用经验,提升本国军力以制衡朝鲜威胁。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朝鲜密不可分。从金泳三到朴槿惠政府,韩国每次强化同日本的安全合作关系,都是同时期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结果。^[54] 而2016年和2017年朝鲜第四、五和六次核试验的成功,也使韩国对目前朝核问题解决机制和朝方弃核态度感到失望。事实上,伴随着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飞速发展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策略的失效。美国试图调整“战略忍耐”并延伸为“接触”(Engagement)和“施压”(Pressure)的双轨政策也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朝鲜发展核导武器的决心和行动。^[55] 朝鲜接连的核导实验和火箭的成功发射也彻底宣告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朝“战略忍耐”策略的破产,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的朝鲜半岛“四月危机”更是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将韩国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美国对朝战略的失败也并未使韩国将解决朝核问题的希望转移至本地区另一大国——中国身上。相反,韩国政府单方面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包庇”也使其对继续携手中国,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寻求解决朝核危机机制信心不足。美中两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策略的有效性不足迫使韩国将合作对象转向域内其他国家即日本。在韩国政府看来,虽然与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分歧不断,但面对朝鲜的现实威胁和美中对朝战略的失效,韩日之间的安全合作应对朝核威胁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

其次,日本则是以“利益平衡”为主导的动因驱使。日本选择与韩国加强安全合作更多是为抓住机遇以扩大本国利益:一是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日本国家安全;二是通过与韩国“联盟”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体制束缚,为“国家正常化”战略服务;三是携手韩国共同制衡中国。对日本而言,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并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56] 塑造一个“稳定而安静”的朝鲜对日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日本加强同韩国安全合作可以推进其对朝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拉近同韩国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朝鲜威胁”的解决,也有利于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57] 国家对外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需求越强烈,建立联盟可能性就越高。^[58] 日本政府准确把握住美国“战略收缩”机遇,不断加强在亚太乃至全球地区安全议题上的干预能力。^[59] 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传统美国主导的“轴辐式”安全框架、加强同美国地区内传统盟友双边关系,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日本一味地服从于美国,而是日本将变得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地区和全球事务。^[60] 在日美同盟的庇护下,日本积极加强同韩国的安全合作来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由“专守防卫”向“积极对外干预”转型,提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同时,日本也认为中国军队将随着实力的增强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从中长期看可能会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联手”韩国将有效威慑中国。日本越来越

热衷于在传统“日美同盟”体系框架下,建构多边主义来遏制中国崛起。日本一直还担心韩国倒向中国,出现中韩“联合”制衡日本的情况,与韩国的“联盟”不仅可以离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安抚焦躁的韩国,也能借此机会牵制崛起的中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美亲近、拉拢韩国和对华强硬都是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右倾目标的重要手段。^[61]因此,日本在对朝战略中,实施接触与打压并行;在对韩战略中,极力拉拢与合作;在对华战略中,秉持重视和遏制并举。可以说日本加强同韩国安全合作关系力图达到“一箭三雕”。

四、日韩安全合作转向“联盟”困难重重

虽然日韩安全合作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出“联盟”的特征,但横亘于双方历史问题和领土归属的分歧,国内政治的发展,外交策略上的差异以及全球性大国的战略调整,都可能成为其制约性因素。

第一,双方在日本对朝鲜半岛侵略行为认知和领土争端议题上的严重分歧未能根本消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强调,历史问题仍然是日韩关系改善的重大障碍,她在任期内多次敦促安倍政府拿出诚意认真解决历史问题。^[62]但是,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明显,其淡化甚至美化日本对朝鲜半岛侵略和殖民历史,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等做法,都一次次刺激着韩国政府和民众脆弱的神经。^[63]同时,日韩围绕关于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矛盾也没有缓和迹象。双方政府都宣称竹岛/独岛为各自固有领土并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64]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宣誓主权的举动引起日方的强烈不满,而2017年日本内阁府官员台台俊介出席“竹岛日”的活动也引起韩方的严重抗议。可以说,虽然日韩在应对外部威胁和现实国家利益驱动下,可能会暂时搁置争议,谋求安全合作,但历史和领土问题将始终是破坏两国政治互信从而影响双方安全合作的“定时炸弹”。

第二,双方国内政治发展的制约。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日韩都不时祭出民族主义大旗来缓解国内政治对抗,转移经济发展乏力的矛盾。^[65]但双方对民族主义泛滥势头的控制都不尽如人意。2012年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是在韩国国内激烈的反日民族情绪压力下迫使韩国单方面放弃谈判。日本安倍政府前三次执政期间,在政治右倾背景下,面对低迷经济态势,借助领土争端不断挑逗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粉饰和否认对朝鲜半岛侵略历史。此举措的主要目的就是日本安倍政府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为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营造政治气氛。^[66]随着安倍2017年10月第四次当选日本首相并组阁,代表日本修宪势力的又一次胜利,韩国媒体也指出日本有可能在修宪道路上更为“右倾化”。^[67]同时,日韩历届政府外交策略差异也将制约双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至今,韩国对日关系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双方安全合作也随着韩方领导人的更迭时好时坏:从下令严查韩日“慰安妇”协议达成过程,到联合国大会期间强调

“美国是韩国的同盟，而日本不是”，^[68]再到做出“三不”^[69]决定为文在寅访华升温。可以说，代表韩国“左派”进步势力的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其对日态度和外交方针使未来日韩安全合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国内这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敌对情绪以及外交策略随国内政治而摇摆不定的态势，将制约双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对华和对朝政策分歧也将阻碍日韩安全合作进一步发展。对华政策上，虽然韩国单方面决定部署“萨德”(THAAD)导弹防御系统使中韩全面增强的“战略伙伴关系”有所破坏，但中韩两国贸易额仍在稳步增长，^[70]且韩国在“联美制华”问题上并无明显动机，它反而期待中美、中韩关系缓和所带来的“政热经热”效应。相反，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快速增长，日本对华大战略则由“接触”和“防范”并举转向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着重对华遏制上来。^[71]对朝政策上，韩国政府更倾向于与朝方的“对话”和“接触”。韩国国内超过82%的民众认同“南北统一”，75%的韩国民众赞同对朝的“对话”而不是“孤立”和“打压”策略。日本则一直追随美国对朝鲜采取更为强硬的“遏制”和“压力”方针，通过对朝韩的等距离外交控制朝鲜半岛统一节奏。^[72]日本认为一个稳定且分裂的朝鲜半岛更有利于日本安全和利益。^[73]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韩国更倾向于“对话”的外交策略与日本所表现出对朝的强硬立场截然对立。这种对华和对朝政策上的分歧也是双方安全合作的阻力。

第四，未来中美和美朝关系能否改善也将使日韩安全合作走向“联盟”充满未知。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和朝核问题矛盾激化使美国认为日韩适度走向“联盟”符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威慑朝鲜的战略预期。虽然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仍充满变数，其亚太战略雏形未现，但截至目前，从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海湖庄园”会晤到特朗普首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中美双方在地区安全、经贸和军事领域合作仍然处于可控范围。如果中美关系在现有和未来对话机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背景下有所缓和，日韩“联盟”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作用将大为减弱。^[74]目前来看，特朗普对于亚太盟友关系网络化发展的兴趣并不大。而且，日韩安全合作走向“联盟”的关键域外因素——美国也不愿看到日韩安全合作不在其主导下更进一步，因为这势必削弱美国作为“轴辐式”安全结构的核心地位，不符合美国继续充当远东地区霸主的战略目标。同时，未来美朝关系的缓和也将阻碍日韩安全合作更进一步。2017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核问题已多次进行沟通并多次重申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变。^[75]美国也在持续向朝鲜施压的同时，留有谈判余地与朝鲜改善目前紧张关系。^[76]可以确定，如果在中美两国共同投入更多精力来解决朝核问题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把朝鲜武力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的日韩双方进一步走向“联盟”的外部动力也将大为减弱。

五、日韩安全合作转向“联盟”危害地区安全局势

日韩走向“联盟”是双方为应对朝鲜威胁、遏制中国崛起和积极配合美国亚

太战略的产物,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历史偶然性。此次日韩突破历史迅速达成《协定》,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抓住了2016年底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丑闻,急于摆脱国内政治困境这一契机。《协定》的签署必将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日韩走向“联盟”将进一步坚定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朝鲜始终认为它处于美国及其东北亚地区盟国的军事威胁中,朝鲜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常规武器方面与美国及其盟友实力上巨大的差距。事实上,美日、美韩同盟一直保持着在经济和军事上对朝的绝对优势,试图保证对朝的“绝对安全”,而朝鲜则缺乏与美日韩平等竞争的常规和核武器力量。因此,朝鲜一直追求其最低限度的“生存安全”目标。对朝鲜来说,在美国消除对朝核威胁,停止针对朝方的联合军演和放弃对日韩核保护之前,核武器将是其维护统治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谋求对美日韩非对称战略优势核心举措之一。^[77]此次日韩签署的《协定》明确指出双方需要共享朝鲜核导信息,并在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上加强军事合作。^[78]该协定目标和手段都直指朝鲜核导计划,其后果必使朝鲜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的唯一反制手段就是发展出威力更大、射程更远和突防能力更强的核导技术,这将使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陷入“安全两难”困境。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和敌对情绪将使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局势一旦失控,甚至将造成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军备竞赛。^[79]

第二,日韩“联盟”将使韩国被绑架在日本右倾化的“战车”之上。军事合作在日韩合作关系中一直属于敏感范畴,《协定》正式签署意味着韩国越过了日韩军事合作的“分水岭”。其实,从宣布引入“萨德”系统开始,韩国就已开启国家安全战略深度调整的“潘多拉魔盒”。虽然文在寅执政后在“萨德”问题解决上表现出比前任朴槿惠更加积极的态度,并一度宣布调查“萨德”发射车秘密进入韩国事件。但是,“萨德”的部署在其任内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且在同样面对中美两国压力时,文在寅仍会为维护美韩同盟而屈服于美方压力,宣布“不会改变上届政府决定”,将“萨德”问题推给了下届政府。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将打破东北亚战略均势和战略稳定,极易在该区域引发军备竞赛并最终影响东北亚安全,韩国也必将成为“受害者”之一。而日本于2016年3月正式实施的新安保法,使其获得了从平时到“有事”时、从本土到周边再到全球自由对外使用武力的权限,从而绕过和平宪法束缚,初步实现其长期追求的“军事正常化”目标。《协定》的签署不仅使日本能够从韩方获得极有价值的投奔韩国的朝鲜高层和在朝中边境获得的人工情报(HUMINT)、侦察机搜集的监听和视频信息(SIGINT),也为日本实际介入朝鲜半岛安全事务打开了一个通道。这无异于客观上支持了日本政治“右倾化”路线。可以预见的是,日韩“联盟”不仅不会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反而会造就一个更加危险的日本。

第三,日韩“联盟”使东北亚地区滑入新“冷战”边缘。日韩签署《协定》走向“联盟”,表面看是为了对付朝鲜、制衡中国,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国在亚太构建新

形式的军事同盟体系，^[80]其结果将导致美日韩与中俄朝等国矛盾的加深，东北亚地区对抗性“联盟”出现的可能性增大。这将迫使域内其他国家为维护本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强彼此间的协调来制衡美日韩安全三角。^[81]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协定》的签署是“有关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加强军事情报合作，将加剧朝鲜半岛对立对抗，给整个东北亚地区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但不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更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82]日韩调整安全合作关系甚至摆出愈加强硬的军事姿态，将打破东北亚战略均势和地区秩序，极易引发大国更加激烈的战略博弈并最终影响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稳定。

注释：

[1]该文中所提及的“同盟”具有特定语义和语境，专指国际政治或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内的“联盟”。由于在汉语体系中，“同盟”和“联盟”两词并未有本质区别，因此在本文行文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同盟”和“联盟”两词交替使用的现象。

[2]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

[3]Im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ress, 1976, p.48; J.F.C Full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45: A Strategic and Tactical History*, Boston, MA: Da Capo Press, 1993, p.208.

[4]胡令远、王高阳：《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6期。

[5]Pual Dibb,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How Useful? How Manageab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2(2002), pp.131—144; Bruno Tertrai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ilitary Allianc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2(Spring 2004), pp.135—150.

[6]“准联盟”被定义为：一种两个国家之间互不结盟却同时与另一个国家结盟的关系。Cha, Victor D.,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汪伟民：《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

[8]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0; Arnold Wolfers, David L. Sills, eds,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268—26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Spring/Summer 1990), p.104; [美]布鲁斯·拉西特、[美]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9]《韩日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11/24/c_129376207.htm。

[10]“轴辐式”安全结构传统上是多个国家围绕一个核心国家构成，核心国以外国家之间却缺乏有机互动的机制和动力。

[11][韩]郑埔洙、[韩]朴成训：《韩日两国将交换除一级机密外的所有军事情报》，《中央日报》（韩），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59997。

[12]石源华、汪伟民：《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王传剑：《日韩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同盟”？》，《日本学刊》2011年第5期；普林波：

《日韩“冷战”的原因与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

[13]石源华、张弛：《韩国朴槿惠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

[14]胡若愚：《力挺外长 朴槿惠坚持对日“双轨”外交》，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5/06/c_127768522.htm。

[15][57]王珊：《日本对韩外交及日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

[16]《韩政府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 否定重新部署核武方案》，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6/10/14/0401000000ACK20161014004300881.HTML>；《韩日美防长将齐聚新加坡 商讨朝鲜核安全问题》，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519/c1011-25035588.html>。

[17]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9.

[18]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2-24;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9 (Spring 1985), pp.9-12.

[19]Bruce E. Bechtol, “South Korea: Responding to the North Korea Threat”,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13, p.3, <http://www.aei.org/outlook/foreign-and-defense-policy/defense/south-korea-responding-to-the-north-korean-threat/>.

[20]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 李开盛：《认知、威胁时滞与国家安全决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21]Kyle Mizokami, “North Korea’s 5 Nightmare Weapons the World Should Fear”,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ive-north-korean-weapons-war-south-korea-should-fear-10841>.

[22]Shannon N. Kile, Phillip Schell and Hans M. Kristensen, “North Korea’s military nuclear capabilitie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

[23]《详讯：朴槿惠主持国安会警告朝若核试就无未来》，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6/04/28/0401000000ACK20160428005400881.HTML>；《日本：朝鲜核威胁已到“临界”程度》，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785>。

[24]陈岳、倪海宁：《朝鲜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7期。

[25]《韩青瓦台拟新设网络安全秘书室应对朝鲜网络袭击》，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allheadlines/2015/03/31/0200000000ACK20150331001600881.HTML>。

[26]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

[27]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June 1994), pp.80-81.

[28]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

[29]“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The World Bank Data 2016,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30]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7/0118/c1001-29030932.html>。

[31]Kris Osborn, “Why the U.S. Navy Could Be in Big Trouble: China Plans 351 Ships by 2020”, *National Interest*, May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hy-the-us-navy-could-be-big-trouble-china-plans-351-ships-16101>.

[32]Young Jong Choi, “South Kore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23, No.1 (Spring/Summer 2009), p.58.

[33]石源华、〔韩〕文恩熙：《试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

[34]王生:《中韩建交 20 年: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课题》,《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5 期。

[35]Tae-Hyo Kim,“Korea’s strategic thoughts toward Japan: searching for a democratic alliance in the past—driven futur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2(February 2008), p.142.

[36]朱峰、〔美〕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06 页。

[37]Ueki, Chikako,“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argumen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6, p.336.

[38]江新风:《日本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军事现代化方向不明》,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mil/4/200907/0721_342_1259835.shtml。

[39]“South Korea in a Changing World: Foreign Affairs”,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2, pp.7—8; Kim Jiyeon, Karl Friedhoff, Kang Chungku, Lee Euicheol, “South Korean Attitudes on China”,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4, pp.11—15.

[40]“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 *The Genron NPO and China Daily*, 2014, pp.15—18.

[41]“Reveal Views on Future of Northeast Asia”, *The Genron NPO*, 2016.

[42]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s.,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p.184—210.

[43]Editorial Board, “President Obama’s Foreign Policy is Based on Fantasy”,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s-foreign-policy-is-based-on-fantasy/2014/03/02/c7854436-a238-11e3-a5fa-55f0c77bf39c_story.html?utm_term=.e813047c28b2.

[44]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2 期。

[45]但是,突然空袭叙利亚,无端指责中国处理朝核问题不力以及意图绕过东亚地区国家单方面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做法又使特朗普是否真正调整美国“单边主义”战略倾向,继续收缩战略被打上巨大问号。

[46]Alexander Gray and Peter Navarro,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

[47]J. Berkshire Miller, “How Trump Can Reassure Asian Allies: The Way Forward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7-02-08/how-trump-can-reassure-asian-allies>.

[48]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57.

[49]Kim TaeHyo, “Korea’s strategic thoughts toward Japan: searching for a democratic alliance in the past—driven futur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2(February 2008), p.148.

[50]张蕾:《美国真心撮合韩日关系 恐难迅速好转》,人民网, <http://he.people.com.cn/n/2014/0321/c338616-20827911.html>。

[51]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0 期。

[52][74]陈建波、张景全:《朝鲜半岛新危机与美国东北亚同盟体系新变化》,《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4 期。

[53]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25, No.2(May 1963), p.183.

[54]詹德斌:《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动向、动因与挑战》,《日本研究》2016 年第 1 期。

[55]Glyn Davies,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3,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us-policy-toward-north-korea>.

[56]姜龙范、郭文君:《朝鲜半岛与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韩国研究论丛》2008 年第 1 期。

- [58] 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 [59][71] 吴怀中:《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 [60] Shinzo Abe, “Towards a Beautiful Country: My Vision for Japan”, *Vertical*, October 23, 2007, p.254.
- [61] 王珊:《试评析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举措》,《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9期。
- [62]《朴槿惠促日继承正确历史观 促朝走对话合作道路》,韩联社,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allheadlines/2015/08/15/0200000000ACK20150815001000881.HTML>。
- [63] [66] 刘江永:《“安倍政治学”与中日韩关系》,《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 [64]《日本再发新资料证明竹岛和尖阁诸岛主权》,日本经济新闻网, <http://cn.nikkei.com/politics-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1619-20160926.html>;《韩国外交部完善韩日争议岛屿宣传资料》,新华社,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8/28/c_128177777.htm。
- [65] 李秀石:《日韩关系的现状及其走势》,《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
- [67]《韩国媒体:警惕日本改宪势力的进一步右倾化》,人民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1023/c35421-29603729.html>。
- [68]《文在寅强调韩美为同盟韩日则非同盟关系》,韩联社,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05000500881>。
- [69] 2017年10月30日,韩国外长康京和接受韩国国会质询时表示“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没有变化;韩国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旨在为文在寅第一次访华营造良好气氛。
- [70]《2017年5月韩国进出口及中韩双边贸易情况》,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cj/201709/20170902645607.shtml>。
- [72] Tsuneo Akaha, “Japanese Policy toward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Balancing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ume:42 Issue:3-4, (June 2007), pp.299-301.
- [73] 王传剑:《试析冷战后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两重性》,《东北亚论坛》2000第1期。
- [75] Tian Shaohui, “Xi, Trump discuss ties,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over phone”,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4/24/c_136231770.htm。
- [76] John Delury, “Trump and North Korea”,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17-02-13/trump-and-north-korea>。
- [77] 高浩荣、张滨阳:《朝鲜提出放弃核武条件 要求美国消除对朝核威胁》,搜狐新闻网, <http://news.sohu.com/20090113/n261733467.shtml>。
- [78]《韩日签署〈军情协定〉为深化双边军事合作起步》,韩联社,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allheadlines/2016/11/23/0200000000ACK20161123002400881.HTML?input=www.weibo.com>。
- [79] Doug Bandow, “Let Them Make Nukes: The Case for Friendly Prolifer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japan/2016-07-26/let-them-make-nukes>。
- [80] Sarah Teo, “Japan-South Korea military cooperation: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Vol.115, No.1 (July 2012), p.2.
- [81] Jae-Jeok Park,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the South Korea-Japan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 *RSIS Commentaries*, July 2012, p.3.
- [82]《2016年1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17974.shtml。

[责任编辑:刘 璠]